

他们：创造许多第一，写下徽州之最



一代代的徽州人在这片土地上抒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至今影响着许多人。他们写下了许多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留下了一个个徽州之最。这也是徽州曾经繁荣不断发展的明证。 朱玉婷

徽班之最： 最早进京献艺的徽班——庆升班

“徽班进京”永远将是一段辉煌的历史。第一个带领徽班进京献演的便是著名的清代官员曹文植。他和其子曹振鏞是当时有名的“父子尚书”。1790年为乾隆皇帝80大寿而进京祝寿的，而后才有“四大徽班进京”。庆升班活动时间长达150多年，这一纪录也创下徽班之最。

为孝敬母亲改良戏班

户部尚书曹文植在京城官场上呆了28年后打了离职报告，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回徽州之前，曹文植去了一趟扬州招了一班童伶，将他们带到徽州去，让自己的老母亲在歌舞升平中颐享天年。

为了取悦老母亲，用心良苦的曹文植开始了扩大和改进戏班的努力，首先是从附近的戏班中请来老艺人做教师，对童伶们加以辅导，丰富和改进了原来的唱腔，当徽州腔和昆腔不再是楚河汉界的时候，传统的弋阳腔一变之下，成了二黄平板，这也是后来徽班进京所采用的主要唱腔。为乾隆祝寿将徽剧带进京城

1790年，已被恩准归养三年的乾隆皇帝重臣曹文植奉诏赴京入宫，参加皇帝的寿诞

庆典。为贺寿献礼，曹文植带上蓄养的家班华廉班(后更名“庆升”班)，一同来到北京，在宫中演戏两天两夜。

曹文植家班的这次演出，共演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皇亲国戚们称赞不已。“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道路。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在不断的同台演出中，逐步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学位之最： 获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胡适

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而最终仍然回归并认同本国文化精神的国学大师。他们先是求学于中国，大量阅读传统文化典籍，后又远渡重洋，广泛深入地研读西学。而其中拿到学位最多的人是安徽绩溪人胡适，他一生共拿到35个博士学位。

首个博士学位十七年路漫漫

胡适1910年通过艰苦的准备，一路过关斩将，通过考试获得了美国用庚子赔款余额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他先是学农，后又辗转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洲各高校之间，如饥似渴地钻研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学与科学，到1917年学成归

也曾拒绝康奈尔大学的破例学位

此后胡适一路鸿运高照，种种博士头衔纷至沓来。在1935至1959年间，胡适共获得了35个博士学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国家和地区遍及美、英、加拿大和香港。其中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若按学科分，则法学27个，文学7个，人文学1个。当然，其中不少是“荣誉博士”头衔。

更有甚者，胡适还放弃了许多次获荣誉

国。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到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胡适哲学博士学位，前后相隔十年，其间外界有很多的议论或猜测。如果从胡适1910年开始准备留学算起，到他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前后花了长达十七年时间，可谓在西方求学位道路漫长。

博士学位的机会。1940年3月21日，他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去年得了2个荣誉博士学位，因病辞了3个。”1941年1月21日，美国就任总统举行就职典礼，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参加授勋，胡适未去，又舍掉了一个博士头衔。此外，胡适留美的第一个学校康奈尔大学，曾打算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因该校校史上未有先例，胡适不愿“破例”，又抛掉了一顶博士桂冠。

珠算史之最： 最早在《清明上河图》发现算盘的人——余介石

他在故宫宋画《清明上河图》上发现了算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将中国算盘的发明时间又前推了三、四百年。他就是我国珠算史研究上功勋卓著的学者，祖籍安徽黟县人余介石。



故宫博物院古画上的意外发现

1956年，余介石教授当时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中国算盘与珠算的发明时间”。为此，他查阅、研究了许多宋代的典籍，并从郑振铎的《清明上河图研究》一书中得到启发，独辟“古画之中觅算盘”的蹊径。于是，余介石教授约了他的好友、著名珠算史家殷长生教授

一块来到故宫博物院的古画馆，手举高倍放大镜，隔着玻璃在珍藏着一张张古画的展柜前搜寻、寻觅……突然间，他们的目光同时被定格在宋代名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因为他们在该画的卷末赵太丞药铺柜台上，惊讶地发现了一只类似算盘的东西。

将算盘发明时间提前三、四百年

余介石、殷长生两位教授紧紧抓住不放，通过深入研究，最终在“是算盘还是钱盘”的争议中坚定地确认并证明了“是算盘”。

殷长生教授专门约请了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高级摄影师，到故宫博物院古画馆拍摄了《清明上河图》古画中的“算

盘”特写放大图，终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件东西确实确实是一只15档中国算盘。这就是说：至少在张择端所在的北宋之前，我国就已经发明和使用了算盘。这一发现，将当时我国算盘的发明时间又前推了三、四百年。

围棋之最： 我国最早的围棋国手——过旭初

徽州人过旭初是著名“棋圣”聂卫平的启蒙老师，他也是我国最早的围棋国手。

过旭初和弟弟过惕生都是著名的围棋大师，棋坛称之为“二过老”。他们是明末清初围棋国手过百岭的后裔，父亲过铭轩早年在歙县开古玩店，精于棋艺。“二过”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幼棋艺过人，过旭初九岁

时在歙县已无对手，被誉为神童。后来他去上海寻师访友，战胜过上海的关祥麟等名手。1924年在北平八宝胡同俱乐部举行的中日围棋赛中赢了日本棋手，获得冠军，一时名声大振。段祺瑞是个棋迷，闻讯后召见过旭初去段府对弈。在以后的两年中，常在北京的公园茶社同段祺瑞及其子

段宏业下棋。

解放后，过氏兄弟应邀来北京筹组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棋社——北京棋艺研究所，过氏兄弟等五人被聘为围棋指导员。他们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代青年棋手。我国棋圣聂卫平9岁时便成了过旭初的入室弟子。 朱玉婷

史学之最： 最早填补晋史空白的人——汤球

黟县白干村人汤球，自幼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初从黟县黄陂名士汪浚学时艺，后拜同邑著名学者汪文台、俞正燮为师，受了相当正规的学术训练，在治学上具备较高的起点。汤球一生以奉养双亲、讲学课徒和研究著述为乐，对科举入仕缺乏兴

趣。当他成年以后，由于学问渊深，著述等身，名声很大，成为宣、歙一带的学者领袖。1867年被推荐为孝廉方正，力辞不就。

汤球平生研究最为深透的是两晋历史，他认为《晋书》缺谬之处不少，因而广征博引，编著了《九家晋纪》5卷、《九家旧晋书》37

卷、《两家晋阳秋》5卷、等多种晋史研究专著，成为晋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除两晋史籍研究和史料辑补外，汤球还辑补了郑康成逸书九种、《太康地记》等地理失书籍三种、《山公启事》等志人小说，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很大便利。 朱玉婷

交通之最： 最早国内铁路工程人员——詹天佑

他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之一；他是中法海战中指挥若定的英雄；他是“近代铁路之父”，最早国内铁路工程人员……他虽然生在广州，祖籍却是地道的徽州人，他就是詹天佑。

留学归国后的詹天佑原想投入中国铁路事业的建设，但当时清廷正为是否修筑铁路而争论不休，无奈之下，他只得选择与自己专业不对口的海军。

1888年，在留美同学开平矿务局的邝孙谋推荐下，詹天佑接到了“中国铁路公司”的聘书，担任工程师，负责指挥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迎来了他投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历史机遇。

甲午战争后，中国铁路建设终于迎来了

它的第一个春天。1896年起，詹天佑以筑路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修筑关内外铁路，负责指导和监察津卢(天津至卢沟桥)铁路的施工。

1905年，清政府为缓和矛盾，决定这第一条的铁路干线从技术到经费都由国人自己承担。詹天佑再次被清廷任命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四年后，经过重峦叠嶂、峭壁高耸的八达岭和居庸关的京张铁路全线竣工，比预期提前两年完成。

自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进入事业上最繁忙的时期，他往来奔波于黄河两岸、长江南北。1912年，詹天佑参与规划全国铁路干线网的工作，筹划设计了中国第一家交通博物馆。 张亚琴

教育之最： 最早提出“教学做合一”的人——陶行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的一句名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徽州人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宅心仁厚，充满爱心，为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矢志不移。他最早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

得知识。

而在教学中，他始终以人为本。曾经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人，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直到男孩承认错误，陶行知满意地笑了，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这就是陶行知著名的四糖故事。 张亚琴